

薄荷糖 (Peppermint Candy)

影片介紹

韓國導演李滄東1999年的電影《薄荷糖》，是觀照南韓轉型正義歷史的重要文本之一¹。片中男主角金英浩是意氣風發的少年，隨著南韓發展，經歷著一連串的命運重擊。電影以不同年份與章節²標示南韓發展，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1990年代炒股過熱、1980年代白色恐怖，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打擊南韓民主最深的事件。

故事表面上揭露小人物一生，內在映照大時代發展，電影裡當兵的金英浩接到軍隊命令，士兵們連自己要去哪裡都摸不著頭緒便被迫匆匆出兵，以為是北韓襲來，沒想到是對抗「自己人」，而英浩失手錯殺女學生，就此改變了他的一生。《薄荷糖》描摹一個個被時代輾壓的受害者，像片中被踩碎一地的薄荷糖，粗暴地被迫奪取青春和理想。

這些時間並非隨機設定，要看懂這部電影，必須理解南韓民主化歷程。縱使度過日本殖民，獨立的韓國並未因而迎來順遂未來。韓戰揭開美蘇冷戰序幕，南韓接連經歷獨裁總統李承晚、朴正熙與全斗煥超過三十年的統治。在美蘇冷戰的國際政治架構下，美國為鞏固東亞夥伴關係，同時制衡蘇聯與共產中國勢力，具備穩固局勢能力的威權統治者便受美國支持，無論是南韓的李承晚抑或臺灣的蔣介石皆然。

¹ 相較臺灣電影，近年南韓影視更擅處理轉型正義議題，力道生猛，也絲毫不避諱直面。以南韓民主發展史最重要的「光州事件」為例，直接或間接提及該議題的電影就有《薄荷糖》（1999）、《殺人回憶》（2003）、《緣起不滅》（2003）、《華麗的假期》（2007）、《26年》（2012）、《南營洞1985》（2012）、《正義辯護人》（2013）、《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與《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2017）等。

² 以七個篇章展開主角金英浩的一生，每篇也都各自標註時序——「郊遊」（1999年春）、「照相機」（1999年春）、「人生很美麗」（1994年夏）、「告白」（1987年春）、「禱告」（1984年秋）、「會客」（1980年五月），到最後與首篇同名的「郊遊」（1979年秋）。

背景介紹：韓國光州事件與民主化歷程

1980年發生的光州事件在韓國現代史中有著重要意義。從當時還是全羅南道首府的光州一觸即發，光州作為南韓西南部城市，其所屬的全羅道一向是「全羅道與慶尚道」地域對立中被歧視的一方。談及南韓地域情結，指的是湖南地區（全羅南北道、光州）與嶺南地區（慶尚南北道、釜山、大邱、蔚山）的對立。

慶尚北道出身的朴正熙就任總統後，選擇於慶尚道發展工業主力，政府官員也大量任用慶尚道出身者，成為一眾「嶺南官僚」。相較之下，備受冷落的全羅道基礎建設不足，長期停滯為農業區，因而導致湖南地方產生相對剝奪感。此情結讓光州在歷史上往往成為反對勢力陣營，直至近代仍能在選舉版圖中觀察到清楚的地域對立。上至政府人事，下至民間觀感，地域對立的影響皆相當顯著。

在光州事件事發前一年，已執政十七年的獨裁者朴正熙被暗殺身亡，韓國社會看似盼來自由民主，沒想到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採取更緊縮的獨裁統治，甚至宣布全國戒嚴。

隔（1980）年5月18日，不堪獨裁統治的光州學生與市民發動抗爭活動，面對失控局面，當時升任中將的全斗煥下令鎮壓，最終死亡人數不得而知（官方公佈約兩百人，但實際被認為數字遭到低報）。即便光州事件在軍政府全面鎮壓下流血作收，但往後數年受難家屬的追悼會及示威逐漸凝聚「追求真相」的聲音，其中又以學生為主力。為抗議美國政府默許光州屠殺事件的發生，韓國學生曾三次占領美國文化中心，提高國際社會關注度。

然而，全斗煥1987年發布的「413護憲措施」才是真正使抗爭擴及全國的導火線。全斗煥不但沒有回應國民對民主化的高度期待，更表示拒絕

修憲，意圖長期執政，再加上接連發生的醜聞，包含當年一月首爾大學生朴鍾哲刑求致死事件、前一年女大學生權仁淑被性刑求的事件曝光，以及延世大學生李韓烈被催淚彈擊中後不治等，使六月民主化運動串連至中產與白領階級，群眾紛紛上街響應。面對難遏止的示威與美國政府壓力，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盧泰愚終向民意投降，發布「629民主化宣言」，在1987年實現總統直選，帶領南韓走向民主化。

探討議題：國家機器下的基層加害者心理狀態

1980年代韓國經歷軍事獨裁，臺灣同樣處於風雨飄搖的民主化時代。如1979年朴正熙遇刺後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前二天，臺灣正發生美麗島事件，加上其後的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都是與爭取民主相關的人民受難史。

無所不在的監控與高壓獨裁人治，雖釀成社會傷痕，卻也喚醒人民抗爭意志。1987年，臺韓同在社會民意與國際壓力下開始民主化，全斗煥接班人兼總統候選人盧泰愚，6月29日發表「六二九宣言」，承諾將實行總統直選制，廢除間接選舉制，六月民主運動落幕；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則在二週後的7月15日解除戒嚴令。其後，李登輝總統在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影響下，廢除「萬年國會」，最終於1996年實現總統直選。

然而，迎來民主後不代表過去累積的傷痕與歷史錯誤便能一筆勾銷。《薄荷糖》涉及轉型正義議題許多層面，並以受難者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為核心，雖然片中主角最終以悲劇收場，但現實中仍存在許多受難者努力走出陰影，也待更多社會資源的投入加以協助。

《薄荷糖》示現著人被國家機器利用而去毀滅別人，也描繪一個人如何被社會毀滅。不過，這部電影如何讓臺灣的轉型正義工程有所省思？其中思考點在於「加害者」。

片中金英浩是受害者，也是加害體系的基層參與者。這不僅是韓國的挑戰，也是臺灣的待解難題。走過相似歷史軌跡的臺灣與韓國，威權都曾構築密不透風的加害體制，我們遲早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揭露過去時，應當如何看待那些基層加害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意指那些納粹時期作為劊子手的執行者，他們本性並非多麼邪惡，甚至相當普通正常，只是由於加入納粹，就將屠殺視為一項「工作」。這並不代表他們無辜，反倒因危險的「不加思考」，使其成為罪行共犯，因為盲從與隨波逐流也是邪惡，「服從」其實無異於「支持」。

追求真相在轉型正義工程中相當必要，影視、文學和藝術更是幫助大眾理解受害者的管道，也是轉型正義不可或缺的一環。正因理解與記憶，便是最重要的安慰。虛構的《薄荷糖》雖不若紀錄片貼合史實，但它也肩負還原歷史真相的任務。那些被刑求的嫌疑犯、光州現場偶然路過卻喪命的女學生，都為那些成為箭靶的無辜百姓發聲。許多人當時被貼上標籤污名化，對於被國家機器碾碎的他們以及其家屬後代而言，還原歷史真相著實是遲來正義。

聚焦臺灣：如何重新追究「平庸的邪惡」

在臺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2022年發布的「任務總結報告」附錄三，便已透過訪談威權統治時期的軍法官，促使軍法官回顧過去的起訴與判決。訪談紀錄中可見受訪的軍法官皆強調戒嚴時期法律在該時空背景下的正當性。不但全盤接受戒嚴法制，還鞏固威權體制，並未試圖做出相對合理判決，一味聲稱「不得不」，實是推卸責任之舉。

如此討論在臺灣則導引至另一核心問題——那就是我們如何在法律上定義加害者？

若要定義加害者，便高度仰賴行為者、加害行為與加害體制資訊的清楚釐清，本身即為龐大挑戰，不僅如此，「加害」的界線如何劃分也難以清晰界定。目前關於「識別加害者」的法條，僅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第 6-2 條「關於辦理第六條第二項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之相關事宜，另以法律定之」。

因此，臺灣轉型正義目前遭遇的最大難題，在於定義與追訴加害者的難題。放眼世界各地的轉型正義工程，有的國家選擇追究加害者，如東歐前共產國家捷克、波蘭與匈牙利等皆有程度不一的《除垢法》（Lustration Law）；有的國家則尚在「真相揭露」的過程中努力著，落實「揭露威權履歷」。這條路高度仰賴社會溝通，是臺灣落實轉型正義不可迴避的課題。

對於加害者的討論雖不夠，但已有所進展。進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建置，目前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維運的「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我們可以看見白色恐怖時期受刑人的審判過程，如從一審至終審時的審判機關，以及各階段審理人和刑期變動等。舉例來說，1952 年判決的「張燕梅案」原刑期在呈到總統府後被參軍長無端加重，又在經手蔣介石時，被大筆一揮改判死刑。亦有些案例，法官雖然起初堅持自己原本的判決，未判當事人死刑，但在幾度遭蔣介石退回後，也不得不改判當事人死刑。

藉由這些案例判決的過程，我們對於加害者的責任歸屬即具備研究根據，也能看見除了蔣介石與高官之外，仍有哪些人物參與其中——這些都是共犯結構下的基層加害者，也能作為臺灣往後若要追訴加害者時，所需的有力憑證。

從《薄荷糖》開始，回望臺灣的狀況與未來，在轉型正義的道路上，資訊披露推動著轉型正義工程前進。如何重新審視、定義、追究加害者？今日的臺灣只見受害者檔案，加害者臉孔因欠缺嚴謹定義與系統性整理而

顯得十分模糊，我們又該如何處置？縱使過去無法改變，但對於那些在禁錮年代無端逝去的人們而言，如此政策都是讓社會往真相的方向，可貴地又更靠近一些。

延伸閱讀：

戴斯蒙·屠圖（2013）。《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彩虹之國的和解與重建之路》。新北：左岸。

朱立熙、王政智、鄭乃璋（2020）。《黎明前的半島記憶：韓國人權與民主紀行》。臺北：時報。